



人性  
與自我  
修養

杜維明

人性與自我修養

杜維明 著



人性與自我修養 / 杜維明著. --初版.

--臺北市：聯經，1992年

364面；14.8×21公分。

ISBN 957-08-0796-2(平裝)

ISBN 957-08-0804-7(精裝)

[2001年11月初版第三刷]

I. 儒家-中國-論文, 講詞等

121.207

81002407

# 人性與自我修養

---

1992年6月初版

定價：新臺幣平裝320元

2001年11月初版第三刷

精裝390元

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Printed in Taiwan.

著 者 杜 維 明  
發 行 人 劉 國 瑞

---

出版者 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臺北市忠孝東路四段555號

台北發行所地址：台北縣汐止市大同路一段367號

電話：(02)26418661

台北新生門市地址：台北市新生南路三段94號

電話：(02)23620308

台北基隆路門市地址：台北市基隆路一段180號

電話：(02)27627429

台中門市地址：台中市健行路321號B1

台中分公司電話：(04)22312023

高雄辦事處地址：高雄市成功一路363號B1

電話：(07)2412802

郵政劃撥帳戶第0100559-3號

郵撥電話：26418662

印刷者 世和印製企業有限公司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0130號

---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倒裝請寄回發行所更換。

ISBN 957-08-0796-2(平裝)

聯經網址 <http://www.udngroup.com.tw/linkingp>

ISBN 957-08-0804-7(精裝)

信箱 e-mail: [linkingp@ms9.hinet.net](mailto:linkingp@ms9.hinet.net)

## 聯經中文版序

二十四年前（一九六六），我從台北寄出一篇英文論著給夏威夷的《東西哲學報》主編摩爾（Charles A. Moore）先生，不久收到來信，兩整頁不空行的長篇，對我的構思行文都作了嚴厲的批評，特別是針對我聲稱仍屬「初稿」，他提出了尖刻的抗議：即使是自命不凡的哈佛研究生也絕不應把尚未完成的作品投遞享有國際聲譽的學報！不過，在最後一段，摩爾先生竟心平氣和地說，這篇文章確有「希望」，如果我修定後正式投稿，他願意慎重考慮出版。不久，摩爾教授仙逝（夏大為了紀念他創辦《東西哲學報》及主持東西哲學家會議的業績，近年來還特別建造了一座摩爾大廈表示敬意），摩爾的繼承人道啟（Eliot Deutsch），接掌學報不久即來信聯繫。本書所收的第一篇就是一九六八年在《東西哲學報》發表的〈仁與禮之間的創造緊張性〉的中譯。這個課題的探索揭開了我從事反思儒家

哲學中心價值的序幕。〈作為人性化過程的禮〉(第二章)、和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在印度的馬德拉斯(Madras)宣讀的〈從宋明儒學的觀點看「知行合一」〉(第六章)都是同類的工作。

一九六八年我完成了以分析王陽明的「知行合一」思想為主題的博士論文，正式走上以教研為主要關切的學術之旅，陽明的「致良知」一直是我所關切的哲學問題。我總覺得陽明自稱經過「百死千難」才悟出的道理與時人因獲取太易而所論常如隔靴搔癢沒有什麼可會通之處。〈主體性與存有論實在——王陽明思維模式闡述〉(第十章)、和〈王陽明四句教探究〉(第十一章)，即是設想進一步體會陽明教言的嘗試。〈四句教〉一文是應西谷啟治和阿部正雄兩位日哲的邀請而撰得的，因此在《東方佛學》(Eastern Buddhist)刊出。

〈心與人性〉(第八章)是評介牟宗三先生《心體與性體》三冊的論文，〈重建儒家傳統〉(第九章)是評介錢穆先生《朱子新學案》五冊的論文，〈作為哲學的轉化思考〉(第十二章)則是評介丁博先生《聖人和社會：何心隱的生涯與思想》(英文)的短篇。這三篇書評(前兩篇刊在《亞洲學報》，後一篇刊在《東西哲學報》)把宋明儒學中的身心性命諸問題提到學術議程之上。一九七〇年在亞洲學會宣讀的〈宋明儒學的「人」的概念〉(第五章)，雖是一般綜述，但也是對美國漢學界只從政治意識形態來認識儒家傳統的陳見提出質疑。近年來，在歐美學界從道德哲學、比較宗教學，及美學的角度來發掘儒

家傳統的精神資源的例子已屢見不鮮，但回顧二、三同道孤軍奮鬥的往事難免會有創業維艱的嘆息。

一九七五年應「美國人文、科學和藝術學院」(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之邀，為其以希臘建造迷宮和發明人翼著稱的巧工《代達羅斯》(Daedalus)命名的雜誌撰文。〈儒家的成人觀〉(第三章)能通過這個媒體流傳英美知識界是難得的助緣。〈論孟子的道德自我發展觀念〉(第四章)刊在《一元論者》(The Monist)也達到了和歐美專業哲人交通的目的。〈內在經驗：宋明儒學思想中的創造基礎〉(第七章)則刊在由普林斯頓美術館出版的《藝術家和傳統：中國文化中的古為今用》一書中。因為這篇感性的短文在美學界結識了不少道友，是意料之外的收穫。

〈顏元：從內在體驗到實踐的具體性〉(第十三章)和〈熊十力對真實存在的探究〉(第十四章)兩篇學術論文都是在美國學術聯會支援的國際研討會中提出討論的。我深信通過對塑造儒家傳統有貢獻的人物的理解來闡述身心性命之學的真实內涵，不僅有助於對儒家哲學的中心價值進行深層的反思，而且可以為獲取儒門的人生智慧創造良好的條件。其實，「親師取友」乃至「尚友千古」本是「吾儒家法」。如果能通過原始資料(書信、語錄、自傳、論說等等)，私淑幾位古今大儒，受益良多。

〈儒家思想：近代的象徵和實質〉是在文革風暴期間(一九七四年)草就的，本來沒

有發表的意願，但因不能預期的原因而刊行流傳，還引起了一些反響，也就順其自然，由其自生自滅。不過，當時所獲得的材料充分顯示「儒家論說」(Confucian discourse)是認識大陸思潮不可或缺的背景了解(background understanding)；對一個只能從書寫文字(而不是面對面的交通)來揣測大陸學風的思想工作者來說，能把儒家中心價值提出討論而且受到從事當代中國研究的國際學壇的重視，已是彌足珍貴了。固然，今天儒家傳統與中國現實的緊密相關性，已是不刊之論，雖然從正面肯定或從負面否定的立場尚多爭議，但在七〇年代初期，強調儒家正面的重要性，需要傻勁也需要勇氣。

這本論文集曾由北京大學的胡年和于民雄翻譯為中文，以《人性與自我修養》為書名，收入中國文化書院所刊行的中國文化與文化中國叢書裡，由北京的中國和平出版社出版(一九八八年)。我很感激胡、于兩先生在寫作環境極差的時間壓力極大的困難中幫助我把「儒家信息」在大陸傳達。我曾收到湖南鄉下一位才十五歲的知青因讀《人性與自我修養》有所興發而寄來的問學書。他不贊成我所謂「儒門淡薄」的悲觀，而且為我過分「歐化」的語詞作一些建議性的修訂，這類回響使我振奮。不過大陸版沒有原序(多半讀者不知道這些論文都是十五年前用英文發表的舊作)，又因刊行倉促把注腳全部刪除，而且文字錯誤也特別多，不能反應英文本成書的「堅苦」。

承蒙聯經出版事業公司總編輯林載爵教授的厚意，我很高興這本論文集的中譯能有重



新在台灣刊行的機會。東海大學的張端穗教授，不僅把注腳全部譯出，而且重新詳閱大陸版，作了比重譯更艱難的校讎工作，使全書面目煥然一新（譬如顏元第十三章便徹底重新翻譯）。大陸版原有龐朴的叢書總序和湯一介為《人性與自我修養》撰寫的前言，我接受了聯經編輯部的建議為聯經版撰寫了這個新序，說明原委。龐、湯兩序只好割愛。

我雖然常用中英雙語撰文，但在翻譯自己論著方面卻乏善可陳。固然我不願只停留在「雙語主義」(bilingualism)的層次，其實，嚴格意義的「翻譯」正是我努力的目標，但我從來沒有把自己的英文(或中文)論著翻譯成中文(或英文)的奢想。我是希望從中英雙軌的實踐中汲取培養語文能力的經驗，能否相得益彰，當然不能只從「雙語主義」來證成。因此我由衷地感激張端穗教授這番苦心(不必提苦工了!)最後，虞韻琴悉心校對全稿，改正不少錯誤，一併在此致謝。

杜維明

一九九一年十月

美國，麻州，康橋

## 原序

一九七七年的春天，前紐約新學院的納爾遜（Benjamin Nelson）教授建議我把幾篇業已發表的儒家思想論文集結成書。他並主動提供正由他主編的一序列有關比較文明研究的專論作為出版的渠道，同時他還答應為我的論文集寫序，從比較文明學研究的角度，介紹我的學術工作，使我極感欣慰，也倍覺榮幸。一九七七年九月十七日納爾遜教授正在德國講學時期竟不幸因心臟病突發而客死異鄉。他的逝世對我們這些深受其充滿活力的人格所召感、其生趣盎然的學術所鼓舞的文化工作者，確是一大損失；尤其是我，對這位敬愛的「師友之間」的人物的猝然離去更感到悲痛。我們原已商定要共同撰寫三篇從比較文明學的角度來探索中國和西方的論文，其中一篇是以中古基督教的「良心」（Conscience）為線索，集中探討宋明儒學的心性問題。

由於我的同事蘭克斯特（Lewis Lancaster，柏克萊加州大學東方語文系）教授的勉勵，我終於鼓起勇氣把這幾篇論文安排成專書的形式。他所主持的「亞洲人文出版社」決定重新排印全稿，為我提供了改正一些錯誤和進行少量校訂的機會。我很感激愛德勒（Joseph Adler）先生、湘納（Betsy Scheiner）女士和湯森（Tracy Thompson）女士在這方面給我的協助。

我對在歷史和哲學界不斷給予我智性支援的老師和朋友也表示真誠的謝意。我想特別提到這些年來對我啟發良多的談友：（以英文字母為序）張灝、陳榮捷、陳啟雲、狄百瑞（Wm. T. de Bary）、洪銘水、林毓生、劉子健、劉述先、梅廣、墨子刻（Thomas A. Metzger）、牟復禮（Fritz W. Mote）、凱德利（David N. Keightley）、湘納（Irwin Scheiner）、史華慈（B. I. Schwartz）、魏克曼（Frederic E. Wakeman, Jr.）、楊聯陞和余英時。我也要感謝由美國學術聯會（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所支援的「柏克萊儒學研討會」的會員；近年來他們對我學術工作的批評和指正確使我眼界大開。我尤其要對余佐翰（John Ewell）先生、研討會的祕書和記錄員表示萬分謝意，這裡所收的好幾篇論文的初稿都經過他們精心的審閱和批評。

同時我必須提到，由唐君毅、牟宗三及徐復觀三位業師所領導的「東方人文友會」雖

然沒有直接參與我在美國的「經院式」的會談，但友會諸公所創建的那個純粹以人文精神相提攜、且饒有人生意義的「溝通世界」，卻經常為我的工作提供了滋養。

杜維明

一九七八年六月  
美國，加州，柏克萊

## 導言

儒家思想是人類歷史上最豐富、最悠久的精神傳統之一。本書中的十二篇論文及三篇書評是我企圖了解儒家思想的一些研究成果。經過再三思考我在這些初步的探討中所研究的內容後，我故意選擇了「精神」這個詞。首先我必須指出，我的目的在以一種分析的、描述的方式來檢討儒學思想模式的某些顯著特徵。我致力於研究的這些問題往往會讓我以一種非常肯定的眼光來詮釋儒學傳統。但我的這些選擇是出於方法論的考慮，而不是蓄意要去維護一套受人詆毀的思想體系。

當然，我以為使我傾心的儒家知識只有少數研究中國思想的同好才知道。半個多世紀以來，在西方的中國學者和大部分中國的知識分子都注重所謂的儒家文化的「陰暗面」。作為一個思想史學家，我當然敏銳地注意到儒家對傳統的和現代的中國所起的負面作用（如

專制政治、老人政治及男性取向等)。最近幾十年間反孔運動的高潮迭起，(文化大革命中的批林批孔是可能的例外)在我看來，是二十世紀中國最優秀的心靈對一種業已過時的生活方式進行嚴肅的思想批判的結果。

然而，用現代的觀點來評價儒家思想是一回事，而從現代意識形態中所謂的優勢，不論是科學主義、民族主義或社會主義，來抨擊儒家的象徵系統卻是另一回事。前者是以發現的精神來試圖理解及正確理解一個文化現象的一種詮釋的藝術；而後者卻來源於善辯者的說教，其明顯的目的在於把一個傳統化約成一套公式的權法而已。近代中國某些最優秀的心靈積極參與一次又一次地重新評價儒學傳統的事實，當然說明了在致力中國的現代化者眼中傳統的處境堪憂。但當我們探究在中國的現代化的意義時，我們立刻就會為那些甚至「新世界」、「新思想」、「新潮流」和「新生活」最優秀的支持者屢屢不能正視文化認同的問題而感到震驚。

事實證明，在思想戰線上要使中國現代化的各種策略結果已經變成條條空想的捷徑：其意圖在於從西方引進富強的「金針」，而不被本土文化的深厚根基所壓垮。我相信中國的知識分子已經為了這種空想付出了十分巨大的代價。更糟的是，為了實現任何似乎切實可行的、可能有希望使自己民族免於外族侵略、內部紛爭，及永遠落後之狀態的方案，學術團體已經委身於膚淺。其結果，思想的力量喪失了。代替它的是，帶有或沒有思想理據

的野蠻暴力統治了這個素以「禮樂」之邦著稱的國家。用李文孫（Joseph Levenson）的話來說，文化的政治化是儒家中國的悲慘命運。

然而，我並不認為儒學的命運便已經就此決定了。相反，儒家思想作為中國主要思想力量再度出現的真實可能性是存在的。當然我決不是預言儒家火鳳凰（可以這麼說）將從馬克斯—列寧—毛澤東思想的灰燼中再生。但是我堅信，隨著文化的非政治化成為全民的信條而非只是作為現代化的策略起作用時，那麼儒學在藝術、文學、歷史和哲學中的精神價值將會再度表現出它對塑造整個中國創造性心靈的影響。中國在未來探討文化認同時，能刻意地規避過去最深刻與普及的「中國性」之突出體現（譯案，指儒家思想）的挑戰，是不可思議的。

不過，我要特別提請大家注意，我之研究儒家思想不是出諸一專誠的決心：要使儒家思想與現代中國的意識形態轉化有所關連，雖然我或許已經受到這樣一個願望的影響，我主要的關切一直是盡可能公正地去研究儒家傳統的與眾不同的特點。為了集中心力，我一直先探索它的「內在層面」，希望以此為出發點進而對它的文化、社會、政治等方面的表現作更全面的評價。因此，在方法論上我的優先選擇是，先根據儒學傳統中一些最主要思想家的論斷，研究那曾鼓舞世代傳統中國精深思想家的儒學層面。

不用說，這樣做時，我已對某些自己在研究儒學思想中所獲得的價值有所承諾。事實

上，我十分願意把自己探索文化認同的努力說是具有「儒家」特性的學術工作。當然，我知道具有存在感受的個人選擇會大大地限制一個人用超然的態度來分析和描述一個精神傳統的能力。人們普遍認為一個人越接近於參與者的角色，那麼他就越不容易去履行觀察者的職責。在實際上使公正精神成為必要的客觀性標準似乎與有所承諾的心理是不相容的。

然而，使自己潛心於一個傳統之中，又不喪失批評的敏銳感的困難不是不可逾越的。事實是，人文學科的訓練要求信用的承諾和明智地保持距離之間的不斷的交互作用。說創造性學術的鋒刃經常來自於這兩種學習模式的對抗，可能不是牽強的。詮釋的藝術部分地依賴於我們在感覺遲鈍和過分熱心之間交涉出一條道路的能力。

因此，我研究儒家思想的各篇論文正是些探索，有各種不同程度的成功和失敗。不過，說些些探索，我決不是意味我已實際試圖冒險涉足未知的海岸從而開闢新的研究領域。在陌生的海洋中作冒險的航行的比喻並不是我心中所想的。相反，我一直在中國思想史學者極為熟悉的領域中工作，因此不可能產生那種興奮。事實上，我已迴避了那些對傳統儒家而言是外圍的問題領域。當然，我明白對立論穩固的詮釋立場而言，似乎是邊緣性的主題，如果作進一步的探索，結果可能會成績斐然。但我自己的選擇一直是考察，更確切地說，是重新考察那些長期以來被認為是解決了的問題。這樣我的方法既不是概觀也不是建構，而是，用格伯雷爾·馬塞爾（Gabriel Marcel）的意思，以一種詮釋的觀點來「挖掘」。



我的探索——人們或許會說是一種精神考古學——在十多年以前就已開始。現在的這本書在某種意義上說是我在過去十二年間出於各種考慮，在各種不同場合下的即興之作的匯編。這些論文，雖然內在上是自足的，但它們實際上並不是孤立的嘗試，無寧說是探索儒學傳統的象徵資源單一努力的片斷和部分。當我著手開始研究的時候，我並沒有一個通盤的計畫，也沒有一個詳盡的藍圖來指導自己的行動。然而早年在大學研習的階段便受到傳統中國教授教誨儒家經典的機緣，及在研究所討論課中接觸到現代美國學者對儒家文化詮釋的激盪，一九六六年我決定鼓起心力對儒家的精神價值作長期的探索，以此作為自己專業上的承諾。在某種意義上說，這些論文大都是有感而發，並不只表明專業承諾目標的實現而已。但是我希望在這些文章之下有一個基本的統一性，能引導讀者去賞識儒家思想的「內在層面」。

無可否認，我還沒有形成一個最終的、即將浮現的思想圖象。在這裡我也不能明確地說明它應怎麼被併攏起來。但我想這些精細深入的研究將會顯示儒家的精神價值不能被化約為政治、社會或心理的現象，並且，藉著引進像倫理學、美學、比較宗教和系統哲學等學科來研究儒家精神價值，它們可以作為獨立的人類努力的領域而被好好地研究的。我無意在此誇大這些研究模式的價值；我只是要說明，我的目標一直是經由研究儒家楷模教師的精神生活及研究儒家經典的精神內容來分析和描述儒家思想。